



南朝文学论稿

时国强摇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目摇录

- 大小谢隐逸思想之异同 (员)
- 鲍照古乐府与抒情方式的嬗变 (员猿)
- 鲍诗险俗特征的再认识 (圆猿)
- 鲍诗俊逸特征的再认识 (猿源)
- 近八十年鲍照研究综述 (源圆)
- 陶渊明的悲剧性情感体验 (缘苑)
- 陶渊明的幽默 (远苑)
- 刘宋一代的文化政策与元嘉三大家的
创作 (苑愿)
- 从萧纲的政治处境看其宫体诗的创作
原因 (怨员)
- 近二十年颜延之研究综述 (员园圆)
- 元嘉之治与元嘉三大家的创作 (员园远)
- 论钟嵘《诗品》对谢灵运诗歌的评价
..... (员园苑)
- 论萧子显对鲍照的评价 (员员愿)
- 士庶升降与元嘉三大家的创作 (员员苑)

目摇录

元嘉三大家与晋宋诗运转关	(员缘)
颜鲍谢的名次地位之升降	(员愿)
阴何对永明诗风的承续与创变	(员愿)
结摇论	(圆缘)
参考文献	(圆远)
后摇记	(圆园)

摇圆

南朝文学论稿

大小谢隐逸思想之异同

谢灵运、谢朓都以山水诗享誉诗坛，都因卷入政治旋涡而死于非命，是典型的文人从政的悲剧，是令人惋惜的早夭的天才。然正像他们的山水诗有着显著的因革损益一样，他们的隐逸思想也是异同并存，将他们的隐逸之思作一比较、清理，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诗人及其作品。

摇摇一、隐逸动机之异同

范晔《后汉书·逸民列传序》：“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① 这里范晔认为隐逸的目的在于“求其志”、“全其道”、“镇其躁”、“图其安”、“动其概”、“激其清”，或在于一己之利，或在于表达对社会世俗的不满。无论是自身因素、社会因素，其所以这样做都出于自愿，是适其性情而为。谢灵运对于隐与仕也有着大致与此类似的观点，他说：“山水，性分之所适。俗议多云，欢足本在华堂，枕岩漱流者乏于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谓不然。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

^①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3页。

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邪。”（《游名山志序》）乐山悦水，则“枕岩漱流”；有“爱物之情，救物之能”，则济“横流之弊”。也就是说，归隐抑或干政全在一己之性情，无关乎“胸襟抱负”。谢朓也说自己“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强调性喜隐逸。无可否认，谢灵运、谢朓对于山水隐逸的向往与其性情有很大关系。但就其二人的实际情况来看，二人隐逸之思的产生，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背景。谢氏作为南朝最高士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过巨大作用。谢灵运、谢朓受其家族的影响，素有积极从政，建功立业的愿望。谢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①，谢朓在《答王世子》诗中说：“公子不垂堂，谁肯怜萧艾。”希冀萧子廉（豫章王世子）能垂青提拔自己，以期仕进。然二人都在仕途中遭受挫折，目睹了政治斗争的凶险残酷，在现实中感到压抑不得志，甚至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谢灵运从晋入宋，谢朓由宋入齐，都经历了易代之变。晋宋两世，谢灵运目睹了一系列杀戮动乱，其间被杀的帝王就有晋孝武帝、晋安帝、晋恭帝、宋少帝、宋庐陵王刘义真等，其族人被杀的有：其堂祖父谢琰、堂叔谢混、堂弟谢晦等，其间的乱动既有孙恩、卢循的农民起义，又有桓玄叛逆、刘裕与刘毅的争攘，真可谓波诡云谲，充满了凶险与变数。

谢朓亦曾有相似的处境经历。曹融南对此有较详尽的论述：“谢朓还都，正遇上齐武帝病歿、皇孙郁林王昭业即位（太子长懋已先死）的大事。这时，武帝的堂弟萧鸾受遗命辅政，却乘此把持国柄，阴谋篡夺。次年一年之间，便先后废黜了昭业、昭文

^①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2页。

兄弟，自登帝位，是为明帝，改元建武。是年三改年号，这在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在这次萧齐皇室内部争攘的政治风暴中，密切接近最高统治阶级人物、处身旋涡中心的谢朓，虽是官位逐步升迁，却也亲见了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争夺、屠戮的惨烈，他的好友王融因图拥立子良，在昭业即位十多天即于狱赐死；接着，他曾长期追随的竟陵王子良以‘忧卒’，随郡王子隆也因萧鸾的忌惮见杀。在这血腥弥漫的严峻现实中，他内心震动的强烈，精神创痛的深重，不言可喻。所以，在他出守山川秀丽的宣城时，一面发着‘皇恩竟已矣’的感叹，一面也怀着‘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的欣快。”^①钱钟书在论及山水诗的缘起时说：“又可窥山水之好，初不尽出于逸兴野趣，远致闲情，而为不得已之慰藉。达官失意，穷士失职，乃倡幽寻胜赏，聊用乱思遗老，遂开风气耳。”^②谢灵运、谢朓之山水诗可作如是观，他们的隐逸之思又何尝不是“不得已之慰藉”呢？尤其是谢灵运宦海颠簸，受尽挫折，谢朓虽步步升迁，却也始终满怀恐惧，渴思全身远害。

其二，谢灵运、谢朓都曾亲历凶险，遭人谗言。谢灵运一生源次被免官，一次遭外放，一次被诬为有叛逆“异志”，最后死于道听途说的谋反罪名。谢朓曾因与随王子隆关系密切，而被诬为“年少相动”^③，两次直接卷入政权争夺，最后死于“扇动内外，处处奸说”^④的栽赃。血雨腥风的政治生态及其自身仕宦的挫折

^① 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灵~~灵元年版，第~~四~~猿页。

^② 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三卷），花城出版社，~~灵~~灵四年版，第~~猿~~猿页。

^③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灵~~灵四年版，第~~愿~~猿页。

^④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灵~~灵四年版，第~~愿~~猿页。

失意，无疑是促发二谢归隐之思的一个重要诱因。谢灵运“平生协幽期，沦蹶困微弱”（《富春渚》）及谢朓的“嚣尘自兹隔，赏心于此遇”（《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即是明证。

谢灵运、谢朓的归隐之思除却政治因素外，当时玄风佛学的盛行及崇尚隐逸的社会风尚也起了很大的促成作用。鲁迅说：“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①这里虽说“清谈之盛”，亦可见玄佛流布之广。玄、佛“厌离于世间”无疑助长了离群索居孤寂独处的隐逸之风，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就曾专列《栖逸》篇，对隐逸之士人大加称扬，日本学者兴膳宏也认为“讴歌隐遁在齐梁诗人间是十分流行的。例如沈约，居政府枢要，地位远在谢朓之上，且至七十一岁高龄逝世，作品中也经常表达栖逸之志。如‘将随渤海去，刷羽泛清源’（《和谢宣城》）等。所以《文心雕龙》针对这种空洞虚伪的好尚作了犀利的讽刺：‘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情采篇》）。但是，如果说谢朓所谓的隐逸矫情虚言则未免失之太苛。”^②由此可见，二人都受到了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相较而言，大谢对佛经极为精通，曾为《金刚般若经》作注，著有《辩宗论》等探讨佛理之作，小谢虽在《秋夜讲解》和《永明乐》其八中，也曾用以佛家语，但只是偶一为之，他的隐逸思想中玄佛因素实在太少了。另外，谢灵运的隐逸思想也与其家族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民国~~1955年版，第376页。

^② 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民国~~1985年版，第181、182页。

传统有关。谢灵运曾叔祖谢安出仕时已四十多岁，之前一直在东山隐居。居官之后，仍不忘归隐，史载：“安虽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①，谢灵运祖父谢玄也有归隐之志，直到晚年还希望“从亡叔安退身东山，以道养寿。”^②故谢灵运的族兄谢瞻说：“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③并劝谢灵运不要对别人妄加臧否，而要明哲保身。（见《南史·谢晦传》附《谢瞻传》）谢灵运自己也在《述祖德》诗中称扬其先祖“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可见谢灵运的隐逸之思与其家族传统是有一定关系的。谢朓与谢灵运同宗，受到的影响却似乎不大，谢朓在仅有的一首称颂其先祖的诗中说“宗霸拯时沦”（《奉和随王殿下》其十二），只称赞其功烈而已。

二、隐居方式之异同

隐逸一般住在山林或田园以远离闹市，逃避官场，求得身心安宁。谢灵运、谢朓的隐居方式却与此不同，谢灵运在庄园隐居，谢朓是亦官亦隐。谢灵运“庐园当栖岩”（《初去郡》）两次隐居都在始宁谢氏故宅。由《宋书·谢灵运传》及其《山居赋》可知，谢灵运隐居有以下几个特点：夙援庄园隐居，环境优美。始宁谢氏故宅别业自谢灵运祖父已开始经营，面积辽阔，“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宋书》本传），茂林修竹，禽鸟萃集，风景怡人。而且庄园之内“百果备列”、“采蜜扑栗，各随其月”，甚至可以“既耕以饭，亦桑贸农。艺菜当肴，采药救颓”，“灌蔬自供，不待外求”（《山居赋》），俨然一个独立自足的世外桃源，

①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7页。

② 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7页。

③ 李延寿，《南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47页。

与一般意义上的山林隐居者的穴居岩处及田园隐居者的躬耕乡野，简直是天壤之别。圆媛生活奢侈豪华，纵意恣睢。辞官隐居者一般都较内敛谦和、屏迹栖息。谢灵运也曾说：“矧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斋中读书》）实际上，谢灵运“心迹”俱耐不了寂寞，他在别业内建寺院立精舍，研求玄佛，颂偈说法，与隐士、和尚、名士广泛交友往来，既有文章赏会，又有“莫不备尽登蹑”（《宋书》本传）的山泽之游，而且声势浩大，“从者数百人”，以致临海太守惊为山贼，会稽郡县深受其扰。（《宋书》本传）猿媛贪得无厌，广治生业。谢灵运继父祖修营始宁别业，在其父祖开创的南山之外，别辟北山，广为经营，带领奴童义故门生数百人，“凿山竣湖，功役无已”，为一己之私利，求决回踵湖为田，遭拒后又求怀蝗湖，以致与当地太守相构仇。谢灵运这种飞扬跋扈的隐居方式，固然与其“性褊激，多衍礼度”有关，更与他的政治处境遭遇有关。他在刘宋王朝是被敬而远之地闲置起来了。刘裕代晋后，把谢灵运由康乐县公降为康乐县侯，对他“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宋少帝继位，将谢灵运排挤出京师，外放为永嘉太守。宋文帝对他也是“唯以文义见接，每待上宴，谈赏而已”（《宋书》本传）。而谢灵运自认为“才能宜参权要”，却受到如此待遇，故而“常怀愤愤”。他的游宴无度，登山临水，实在含有对当朝的不满与轻蔑，他与名士宴游赏会，有类于石崇之金谷集会及王羲之兰亭集宴，他谈玄说佛也完全是士族的习尚。可见，谢灵运只是把隐逸当做了政治斗争的手段，一种消极的反抗，他幻想维持旧士族的权势与生活传统，并以此与新贵分庭抗礼。

谢朓没有隐居经历，他说自己：“既欢怀禄情，复协沧州趣。”（《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宣告了自己是以仕为隐。

他在宣城任上，虽也像大谢那样遍游山川、赋诗吟咏，但并不像谢灵运那样荒废政务。从《赋贫民田》《赛敬亭山庙喜雨》等诗作来看，谢朓关心百姓疾苦，重视农事生产，《宣城郡志·良吏列传》说他：“吟啸自若，而郡亦告治。”^①一方面突出了他长于州郡治理，一方面也印证了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冬日晚郡事隙》：“愿言追逸驾，临潭饵秋菊。”《直中书省》：“安得凌风翰，聊恣山泉赏。”谢朓在处理政务之余，甚至在刚刚升迁、参与机要之时，心里仍向往着归隐林泉。因此可说，他所追求的只是仕宦中的闲暇，他是把隐逸当做了精神家园，是疲倦于官场的精神解脱，是对残酷现实的逃避。所谓“疲策倦人世，敛性就幽蓬”（《移病还园示亲属》），正反映了谢朓对于官场倾轧纷争的本能厌倦，以及对于宁静悠闲生活的渴望。而他终究没有幽蓬隐居，则因为隐居所可能导致的清苦贫辛，对于出身名门望族的谢朓来说，是无法承受的。因此隐逸对于真心渴求的谢朓永远只能是心灵的寄托与慰安。

总体来看，谢灵运、谢朓都只具隐逸之思，而不具隐遁之实，故吴騫说：“夫士生衰世，不幸又遇懿戚之变，故宜高举远引以避其祸。朓既昧乎明哲保身之诚，徒贻‘刑于寡妻’之讥。顾其诗有曰：‘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何竟不能自践其言邪？”^②张溥评谢灵运亦曰：“予所惜者，涕泣非徐广，隐遁非陶

^① 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源远页。

^② 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源远页。

潜，而徘徊去就，自残形骸，孙登所谓抱叹于嵇生也。”^① 谢灵运虽高傲自负，但终乏旷迈超俗的梗概之气，不能像陶潜那样固守节操，安贫乐道，亦终不能归隐山林田园。谢朓行事怯懦，更不可能履践矫厉世俗的隐居行为。谢朓坦言：“我行虽纡组，兼得寻幽蹊。”（《游敬亭山》）既要做官又要游山玩水，这种富贵优游的自在生活，其实质仍是身居要职而宅心玄远、遗落世事的士族理想。在这一点上，谢灵运与谢朓是一致的，二人都承袭了世家大族优游生活的情性，贪恋荣华富贵，竞逐于官场，又都缺乏政治家的基本素养，死于政敌的诬告陷害。二人隐居方式的差异与其性格有关，小谢较为孱弱，历凶险则举棋不定，退缩犹豫。其岳丈王敬则邀其谋反，他畏于皇权而告密，落得“刑于寡妻”的笑柄；东昏失德，江祐等人欲与他共谋新主，他又告密，反招致杀身之祸。谢灵运亦曾历政治斗争之凶险，如谢晦被诛，义真被杀，他自己的免官、外放等，但因其性情高傲狂躁，故亦不惧，甚至于兴兵反抗。故张溥认为“康乐死于玩世”、“宣城死于畏祸”。^② 而其性情的差异或与他们家族势力的消长有关。谢灵运当世时，他的堂叔谢混、谢裕相继任尚书仆射，谢澹、谢方明，官至代理太保、会稽太守；堂弟谢弘微、谢晦、谢曜，官至右卫将军、抚军将军、御史中丞；堂兄谢瞻，亦任豫章太守。据《宋书·谢弘微传》谢混曾率灵运、谢瞻、谢曜、谢弘微诸亲侄共为乌衣之游。当谢灵运辞去永嘉太守时，谢晦、谢弘微、谢曜都曾写信劝阻，可见其关系之密切。而谢朓当世时，虽也有些同

^①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灵运~~年
版，第 ~~灵运~~页。

^② 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灵运~~年
版，第 ~~灵运~~页。

族人做官，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作为一个整体力量已大为下降，无复先时的辉煌。谢朓的两位伯父受范晔谋反的牵连被诛，其父仅免一死，流放广州，这样的家世背景也使他不可能像谢灵运那样张扬跋扈。

三、隐逸地位与影响之异同

隐逸思想的渊藪，可追溯至儒道两家。儒家的隐逸多着眼于政治，所谓“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能够施展抱负、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出仕任职；如若不能，则高举远去。可以说，儒家的隐逸是其政治理想破灭的产物，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同时又是在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积蓄力量，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庄子认为：“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① 这段论述看起来与孔子的观点相近，实则有着本质区别。庄子虽然也认为不利的外在环境导致了隐逸的出现，但他同时也认为即使外在环境有利，也应当“反一无迹”归于真理的极致，脱落形骸，物我冥一。并不像儒家那样兼善天下，故而主张：“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② 而那些“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的山谷隐逸之士与“就藪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名

①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3页。

②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3页。

而已矣”^①的江海隐逸之士在庄子看来都不值得效法，真正的最高境界是“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由此可见，庄子的隐逸只着眼于个体存身保命的自适快意。可以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②，代表了道家的隐逸观。

从此以后，隐逸之士多受此影响，或偏重于儒，或偏重于道，或杂糅二家。谢灵运虽然谈玄念佛，但其隐逸目的却类似于儒家的以隐待时，而失去了安贫乐道的精神操守，纵情任性，把归隐当做了干禄之途。谢朓虽无谈玄的嗜好，但其隐逸方式却类于道家对自适惬意的追求。道家隐逸重在适情得意，无疑为后世的“朝隐”提供了理论基础。《史记·滑稽列传》：“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座席中，酒酣，据地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③畏于深山老林幽居生活的艰苦，不愿放弃富裕物质生活的享受，现实处境又不如人意，只好转而追求精神上的超然自得、欢畅自恣。实际上，东方朔是把个人遭世不偶的愤激，转化为了“依隐玩世”（东方朔《诫子书》）的混世思想。小谢受到“朝隐”重在心神超越的启发，幻想在残酷现实的重压下，偷得片刻清闲，于失意中寻求些安慰，于是将带有愤世嫉俗反抗性质的隐逸行为转化为对现实政治的无奈妥协。当然在二谢之前，隐逸之思已是一个被反复表达的主题，但总的来看都不如二谢这样具有代表性。两汉末季的隐

①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页。

②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73页。

③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73页。

逸源于社会的黑暗动乱，较多的具有保全性命、清高固守的味道，魏晋隐逸之思与玄学及门阀政治有关。阮籍、嵇康在他们的诗文中不时流露归隐之思，在生活中也有与隐士交往的行为，但他们终不能真正地“隐居以求其志”，仍不免干涉时政，抨击礼教，具有很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叛逆色彩。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世说新语·任诞》），嵇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妨碍了司马氏的篡权阴谋，故一个被杀，一个饱尝了违心侍主的痛苦。应该说他们的隐逸之思只是其玄学理论的副产品。左思、陆机的归隐之思与士族政治有关，是寒士南人等下层士人受压制不得志的不满与牢骚，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的情绪流露。他们内心渴望的仍是建功立业，且攀附于权贵贾谧，成为人格上的瑕疵。六朝文人的隐逸之思有时不免显得虚伪矫情，如元好问评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论诗绝句三十首》其六）只有陶渊明归耕田园安贫乐道一隐到底，故钟嵘称之为“古今隐逸之宗”。如果说陶渊明代表了真正的文人隐士，则谢灵运堪为以隐图仕的典型，谢朓堪为以仕为隐的典型。以隐图仕的归隐至唐代竟至漫衍为“终南捷径”的风气，以仕为隐的归隐至唐代由白居易归纳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中隐》）的“中隐”理论。由此可见，二人的隐逸思想在文人隐逸史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鲍照古乐府与抒情方式的嬗变

鲍照的古乐府即拟汉魏乐府，汉魏乐府的突出特点是长于叙事，鲍照的拟作改变了这一状况，代之以抒情为主。他的古乐府气势充沛，感情强烈，蕴含着夺人心魄的力量。这种特征与其忧愤不平的情感内涵有关，更与其使用的抒情方式有关。鲍照古乐府的抒情方式主要为奔冲跌宕式、弥漫发散式两类。

(员) 奔冲跌宕式。即情感一泻奔流，回旋激荡。许彦周指出鲍照的《拟行路难》“壮丽豪放，若决江河”^①，刘熙载认为“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②，“若决江河”、“任气使才”即可当做奔冲跌宕式抒情方式的形象描述。奔冲跌宕式抒情往往高调发抒，中经回旋翻转，未复激昂。情感大起大落，波澜汹涌，回肠荡气，所谓“发唱惊挺”主要指的就是这类诗歌。《拟行路难》其六，起句不平之气喷涌而出，似乎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接着却写安享天伦之乐，思绪猛然低落消沉，末句忽又振起，看似自我宽慰，实则代千古正直不遇之士鸣不平。《拟行路难》其七，无端愁思，忽然而起，如怒涛排空，造成极大的冲击力，随后描写郁郁苍苍的松柏园，如同奔涌的激流遇到了开阔的

插图

南朝
文学
论稿

^① 许凯，《彦周诗话》，《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2页。

^② 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浅滩，怒张的情绪顿时低回松懈下来，未又直抒胸臆，再次达到高潮。为了使情感的流程更加动荡激昂，更为强烈有力，鲍照还常常使用对比、比兴、反衬等手法，强化情感的抒发，造成不可遏止之势。《拟行路难》其九，起句便以黄丝之纷乱喻心绪之烦愁，随后以今昔对比，在“死生好恶不相置”与“意中索寞与先异”的巨大反差碰撞中，“不忍见之益愁思”的决绝与怨恨之情激射而出。此类诗歌多是诗人直截了当的内心表白，诗中的景象灌注着诗人强烈的情感体验，它们的描写犹如两个巅峰间涌动着的潜流，诗人借此将胸中的波澜，一浪高过一浪地铺展开来。

为使情感更为汹涌激荡，鲍照的诗中常常会出现相互矛盾的思绪。这两种矛盾思绪的碰撞映衬，更为强烈地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的悲哀与怨怒。《代蒿里行》起句“同尽无贵贱，殊愿有穷伸”很富有哲理，似乎已参透人生，看破红尘，而实际上整首诗表达的主旨却是年命之悲、幽沦之恨。鲍照没有魏晋士人的放浪达观，首句的看似超脱，不过是该诗愤恨情绪的陪衬而已，短暂的故作旷达，并不能掩盖其内心的痛苦，反而更见其生的不幸，因此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思绪，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拟行路难》其四，表达的是忍气吞声强压怒火的悲切。却先以平地泻水为喻，说人生的各种遭遇都是自然形成的，无须愁叹。然而心非木石岂能对受到的打击压抑无动于衷？因此，酌酒自宽，长歌当哭，反更见其内心的无奈与凄苦。所以王夫之评此诗：“先破除，后伸理，一俯一仰，神情无限，言愁不及所事，正自古今凄断。”^①其情感轨迹，则“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汹涌翻滚，起伏动荡。

^① 钱仲联，《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拟行路难》十八，开口便是“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结束是“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宣扬的是委运任化、及时行乐，可“丈夫四十强而仕”四句表达的却是不甘平庸、伺机进取的精神。自信与消沉，混世与自期，在这首诗中得到了和谐的统一，矛盾复杂的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揭示。

鲍照“才秀人微”，既无门阀荫庇，更无财势倚仗，却又心高气傲，孤直梗概，所以，偃蹇潦倒，不偶于时。长期挫折失意使鲍照的内心郁积了无比愤恨的情感，似乎只有通过猛烈狂放的文字表述，才能一吐憋闷已久的压抑之气。同时鲍照又是一位感性而又情绪化的诗人。他不像陶潜借助田园隐居，稀释内心的忧愤，更不像嵇康、阮籍那样在遭遇人生困境后，进行深入的思考，依托玄学获得形而上的超越与解脱，他甚至不能像谢灵运那样，在失意挫折后放浪山水谈玄说佛，鲍照偶尔也会有些哲理感悟，然这些哲理感悟非但不能使他获得安慰，反使他更深刻鲜明地感受到了生的不幸与现实的苦痛。鲍照始终热烈地拥抱着尘世，虽然艰辛坎坷，却从不作抽象的冥想。他的情感始终是入世的，他只是异常敏锐地感受着现实的不公与伤痛，不可遏止地发抒着不满与怨恨。他有时也会把种种不幸归结于“命”，然现实的苦过于沉重，使他无法忍受内心情感的强烈冲突，无法故作旷达，即使偶一为之，也很快被痛苦之流所淹没。他诗中矛盾复杂思绪的并存、碰撞，原因即在于此。

奔冲跌宕式的另一种类型是铺垫高潮式。即先通过铺陈，蓄足势能再运用对比等手法，使情感激射而出。《代陈思王京洛篇》前十二句极言闺阁之富丽，将恩宠荣华推到顶点，随后陡然而转，极言被弃之萧条衰飒，比照鲜明，反差巨大。未用历时性比衬，加深纵向的厚重感，又用双鹤奋飞反衬被弃的孤单，使这首